

中国财政政策 周期特征研究

付敏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财政政策 周期特征研究

付敏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研究 / 付敏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5203 - 3281 - 1

I. ①中… II. ①付… III. ①财政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F8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303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琪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16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周期特征：财政政策有效性研究的新视角	(1)
第一章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财政调控的典型事实	(5)
一 “收放循环”中的“宏观税负”	(6)
二 宏观经济波动与财政调控的典型事实	(21)
第二章 市场化转型中的财政政策周期特征转变	(31)
一 文献梳理	(31)
二 方法论	(37)
三 变量和数据	(42)
四 1952 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总体描述	(48)
五 1952 年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周期特征的计量分析	(51)
六 市场化改革与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动态	(56)
七 VAR 分析	(61)
八 结论与思考	(64)
第三章 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国际视野	(65)
一 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周期：理论和文献	(67)
二 国际环境中的中国基本面数据	(71)
三 方法论	(79)

四	中国政府消费的周期特征及其动态	(81)
五	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国际视野：两阶段方法	(84)
六	结果和结论	(87)
第四章	分税制、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周期特征 ...	(88)
一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90)
二	文献梳理	(91)
三	数据和方法	(98)
四	31 个省份的财政政策周期特征描述	(102)
五	转移支付政策的周期特征	(107)
六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周期特征	(109)
第五章	走出顺周期财政调控的国际经验与政策选择	(117)
一	美国财政政策的演变	(117)
二	美国中长期预算的基本经验	(136)
三	智利的结构预算	(144)
四	走出财政政策顺周期调控的中国方案	(149)
附 录		(153)
参考文献		(161)
后 记		(176)

导 论

周期特征：财政政策有效性 研究的新视角

现代财政政策是在凯恩斯经济学框架下展开的，其作用集中于逆风向调节和平抑经济波动，即在经济衰退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帮助经济体实现总需求扩张、就业增加和 GDP 增长；在经济过热时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帮助经济体抑制过热所产生的通胀风险。尽管发达国家的繁荣期紧缩性财政政策调控已经不像中国这么普遍，但是两种逆风向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在理论上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在 2000 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中，逆风向的财政政策被同时用于萧条期调控和繁荣期调控，积极的财政政策被用于稳增长，稳健的财政政策被用于防通胀。

在财政政策效果的研究上，传统方法集中于财政政策乘数（衡量财政制度宏观调控有效性的主要方法是自动稳定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任何资源都是取自市场，所以论证财政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是财政支出的机会成本，就是财政政策乘数。^① 但是凯恩

① 我们将自动稳定器功能看作财政制度功能，以区别于周期性财政政策，尽管自动稳定器的研究远远滞后于财政政策乘数的研究（见 O. Blanchard, “Comments on ‘The Case Against the Case Against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In Richard Kopcke, G. Tootell and R. Triest (eds.), *The Macroeconomics of Fiscal Policy*, MIT Press, 2006, pp. 62 – 67; O. Blanchard, G. Dell’Ariccia, P. Mauro,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42, 2010, pp. 199 – 215）。王志刚认为相对于财政政策的反周期相机决策而言，中国财政制度的自动稳定功能欠佳（见王志刚《中国财政政策的反周期性效果：基于 1978 年以来的经验事实》，《财政研究》2010 年第 11 期）。

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歧由来已久,大衰退以来最新一轮关于财政政策效果的研究也没有消除分歧、形成实质性共识。在影响最大的三篇文献中,Christina Romer 和 David Romer 认为减税乘数显著为 3,而 Barro 和 Redlick 则认为暂时性军事支出的乘数仅为 0.6—0.7, Ramey 则认为财政支出乘数在 0.6—1.2 之间变动,而时机是识别财政政策乘数的关键。^①

从最初设计的效果来看,财政政策乘数研究可能会存在明显缺陷。一是财政政策乘数是动态的,^②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产出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意味着其自身就会导致产出波动问题。二是财政政策最早是设计用来平抑经济周期的,但乘数研究只是论证了减税或者财政支出具有增加产出的效果,并没有分析这些政策变化是否真的有利于缓和经济波动。乘数研究仅仅论证了财政政策的工具合理性,并没有论证财政政策的政策合理性。

从已有的财政政策研究来看,实际的财政政策未必能做到凯恩斯经济学所要求的反周期调节,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很多文献都证实了这一点,例如 Gavin 和 Perotti^③对拉美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发现,导致拉美国家两倍甚至三倍于工业国家经济波动幅度的重要原因,是财政政策的顺周期特征,也就是说,拉美国家的财政政策不是在平抑经济波动,而是在加大经济波动。文献同时揭示了顺周期现象

① 参见 Christina Romer and David Romer,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Tax Changes: Estimates Based on a New Measure of Fiscal Shock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0, 2010 (June), pp. 763—801; Robert Barro and Charles Redlick,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and Tax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6, No. 1, 2011 (February), pp. 51—102; Valerie Ramey, "Identifying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s: It's All in the Tim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6, 2011, pp. 1—50。

② 参见 Eric Leeper, Todd Walker and Shu-Chun Ya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Fiscal Stimulu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7, 2010, pp. 1000—1012; Valerie Ramey, "Identifying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s: It's All in the Tim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6, 2011, pp. 1—50。

③ 参见 Michael Gavin and Roberto Perotti, "Fisc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Vol. 12, 1997, pp. 11—61。

并不是全球经济的普遍问题，这使我们意识到其中可能会存在缓解顺周期和实现逆周期调控的政策措施。例如 Talvi 和 Végh 发现，^① G7 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非周期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基本是顺周期的，从而将财政政策顺周期特征归结为发展问题。如果顺周期特征是一个发展问题，政策作用的空间就有限，我们只能靠制度建设，而不是简单的政策建议，来消除顺周期现象。除此以外，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的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也就是说，综合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周期，必须同时注意到发展和转型的双重事实，在发展和转型的双重背景下探讨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与政策调控表现问题。

从周期特征角度来观察，财政政策有效在 21 世纪正在变得流行。与传统的强调支出相比，财政政策周期研究把财政政策的决策时机和执行过程中的时滞、政治约束等看作财政政策本身的内容，从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相伴随的角度来研究财政政策有效性。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是采用国际标准方法，分析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周期特征问题。^② 本书试图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创新：（1）注意中国发展与转型的典型事实对于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影响；（2）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系统性转变；（3）采用更全面的指标来分析中国的财政政策周期问题，并注意到价格指数问题；（4）注重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国际比较，使得我们可以在更宽泛的背景下看待周期特征现象；（5）在国际背景下提出改善顺周期现象、实现逆周期调控的制度和政策措施。

本书各部分独立成章而又互相联系，构成对于中国财政政策的系

① Ernesto Talvi and Carlos Végh, "Tax Base Variability and Procyclicality of Fiscal Poli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8, 2005, pp. 156 - 190.

② 参见方红生、张军《中国地方政府竞争、预算软约束与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2 期；方红生、张军《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观察与解释》，《经济学（季刊）》2009 年第 3 期；贾俊雪、郭庆旺、赵旭杰《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制度根源》，《管理世界》2012 年第 2 期。

统性研究。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调控与经济发展典型事实的梳理，我们将市场化转型过程对于财政政策周期的影响归结为从国家强制资本形成机制向社会安全网的转变。第二章从时间序列上定量衡量中国的财政政策顺周期特征的动态，发现市场化改革促使中国走出了顺周期调控，实现了财政支出的非周期，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逆周期程度。第三章是对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国际背景和发展经济学背景的分析，研究发现，制度质量、收入分配和金融市场约束都是影响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重要因素。第四章集中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周期特征问题，尤其注重了分税制及其所带来的转移支付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周期特征的影响。第五章是经验研究，分析了逆周期调控的典型——美国和实现顺周期到逆周期转变的典型——智利的预算改革经验，并为中国的财政调控改善提出了建议。

第一章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财政 调控的典型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宏观经济从大起大落到“高位平滑化”的过程（见图 1-1）。其中经历的体制变迁，是从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到决策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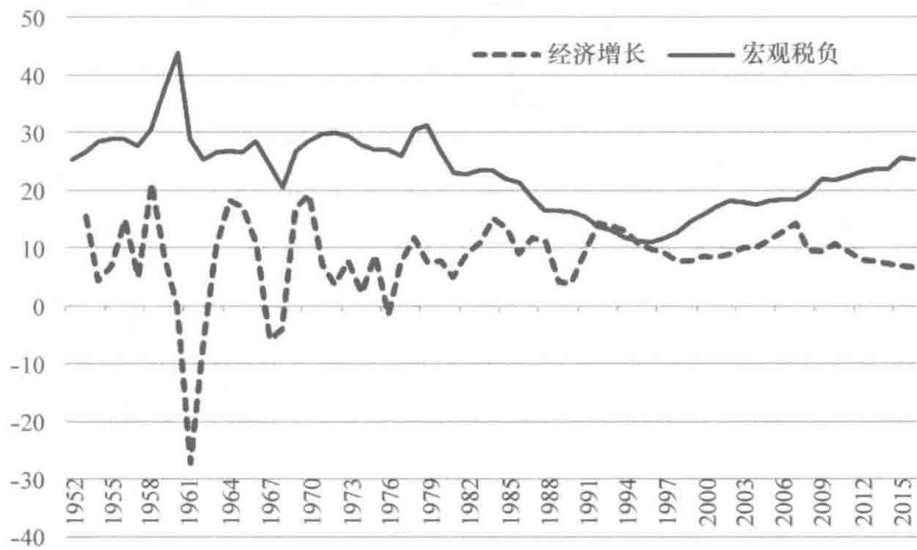


图 1-1 1952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 (1952—2015) (%)

注：宏观税负为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经济增长为 GDP 增速。

数据来源：Wind 金融咨询终端。

经济；从计划体制下的“收放”循环，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分权。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历史，就是财政调控的历史。其中折射出来的转轨特征和发展模式，乃至未竟的改革事业和改革方向的重新思考，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 “收放循环”中的“宏观税负”

对财政调控历史的考察，必须从财政运行的基本经济制度入手。计划经济是中国前 30 年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模式的选择，既有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众多发展中国家独立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也有美苏两极格局对立下的“站队”问题，更重要的，还是由赶超意识形态下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1949—1952 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全面执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功绩，是在全国范围内铲除了在中华大地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覆盖面很广的供销社合作经济，将私人资本改造到了符合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经济计划的范围内。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重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下，国家已经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等国民经济命脉，建立了政企不分、高度集权的财政税收体制。为后续的统一公有制改造和计划经济铺平了道路。^①

1953 年中国开始了快速的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赶超型工业化进程，其特点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为目标模式，压缩消费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资本稀缺的环境中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必须要由政府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扭曲要素配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用计划取代了市场，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1953—1957

^① 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年版。

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8%，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25.4%。以 156 个大型项目为主体的工业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有了自己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得后续的数量分析成为可能。

1950 年 2 月，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随后建立了一个严格“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除按公粮 5%—15% 计征的公粮附加税和若干小税种外，全部公粮和税收归中央统一调度。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开始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预算制度，使预算管理的集中度有所下降。1954 年开始实行预算收入分类分成，将国家预算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预算支出则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分别编制中央、地方预算。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主要支出都是由中央统一拨款，“三级预算”体制以集中为主。1949—1957 年，中央支配的财力占 75%，地方占 25%。^①“一五”期间的财政收入比重基本稳定，保持在 26%—28%。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对斯大林工业模式的反思，中国开始探索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适应本国国情，表现为 1958—1978 年的两轮体制内的“行政分权”^②和由此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大起大落（见

^① 参见倪家铸、严英龙、陈升、章寿荣《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关于分权的划分，1966 年 Schurmann 划分了社会主义分权的两种形式：“分权 I”是将生产决策权下放到生产单位，“分权 II”是将决策权下放到下级行政单位。与“分权 I”的体制改革相比，“分权 II”的核心是体制下放。中国 1956 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时，“分权 I”的想法占优势，1957 年决定实行包含两种分权的混合式改革，1958 年实际执行的则是“分权 II”，而“分权 I”与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经验一起被纳入“修正主义”。1977 年 Bornstein 提出了分权的两种模式：“行政分权”主要是改进原有的行政管理方法，“经济分权”的目标则是走向政府规制下的市场经济（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8 页）。

图1-1)。^①中共八大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系统总结,并集中反映在了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论十大关系》讨论了国民经济农、轻、重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强调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才能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同时又专门论述了发挥地方积极性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传统苏联模式的弊端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损害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认为当前的重点是“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②。随后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由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开始了中国第一次放权实验。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在极大鼓舞了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热情的同时,也暴露了当时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为了推进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1957年11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开始尝试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会议上讨论了计划、工业、基建、物资、财政、物价、商业、教育等方面的管理体制 reform 问题,重点是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向地方分权。4月,中央颁布《关于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放松了对于限额以上基建项目的审查管

① 苏联国内关于采用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还是以计划为核心的“国家辛迪加”来实现工业化道路的争论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布普之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4年发表在《共产主义学院学报》上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其最重要的形式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延缓了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布哈林则针锋相对,论证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和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这次论战因新经济政策的持续而由布哈林获胜。第二次争论是布哈林与昔日盟友斯大林之间的论战。针对斯大林的终止“新经济政策”等一系列“左”倾举动,布哈林反对其最大限度地将资金抽离农业用于工业,批评斯大林为了发展重工业而忽略轻工业和农业的倾向,反对斯大林为了工业发展而将一切用于积累,强调“积累的界限”。第二场争论以布哈林1938年被苏联当局处决告终。这两次论战,也被称为“目的论”和“发生学”之战(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0页)。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9页。

理。随后国务院发出《关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收入项目和分成比例改为基本上固定五年不变的通知》，将 1957 年下放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权规定中的“三年不变”调整为“五年不变”。5 月，发布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6 月，又将工业、交通、商业、农垦各部门所管辖的企业，全部或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9 月，《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开始将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中央和地方的总量分成制度由此建立，计划体制内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放权运动由此开始（见表 1-1）。

表 1-1 1957—1958 年的权力下放

时间	文件（会议）	内容
1957 年 11 月 14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扩大地方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权限。将地方财政收入划分为地方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调剂分成收入三部分，分成比例三年不变。地方预算的年终结余，全部留给地方
1957 年 12 月 13 日	财政部《关于 1958 年对地方财政划分收入的几项规定的通知》	依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情况确定调剂分成比例
1958 年 3 月 8—26 日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讨论了计划、工业、基建、物资、财政、物价、商业、教育等方面的管理体制 reform 问题	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向地方分权
1958 年 4 月 5 日	中共中央《关于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	实行双计划体制，以处理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矛盾，放松了对限额以上基建项目的审查管理
1958 年 4 月 11 日	国务院《关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收入项目和分成比例改为基本上固定五年不变的通知》	将 1957 年 11 月下放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权规定中的“三年不变”调整为“五年不变”
1958 年 5 月 22 日	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几项规定》	将企业实现的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留给企业，由企业在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安排使用

续表

时间	文件（会议）	内容
1958 年 6 月 2 日	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	将工业、交通、商业、农垦各部门所管辖的企业，全部或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
1958 年 9 月 13 日	国务院发布试行《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	将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强化总量分成制度
1958 年 9 月 24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市场物价分级管理的规定》《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	进一步下放计划管理权、物价管理权和财政管理体制
1958 年 10 月 15 日	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举行	提出机构下放、计划统一和财政包干，实行“两放、三统、一包”

说明：作者根据《共和国财税 60 年》（高培勇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中央放松了对于地方基建项目的审批程序，将计划管辖权、基建项目审批权、商业和银行管辖权、财权和税权、劳动管理权、教育管理权和大部分中央所属企业的管辖权交给地方政府。^① 在财经领域中改革预算制度，使其具有承包制特点。1958 年开始实行中央和地方之间“比例分成、三年不变”的体制，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分灶吃饭”和“财政大包干”的先河。在快速的人民公社化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国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② 地方政府的财

^① 1958 年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减少到 1075 个，比 1957 年减少 88.4%（参见金太军、汪波《经济转型与我国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迁》，《管理世界》2003 年第 6 期）。

^② 林毅夫认为，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是导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大幅下滑的主要制度原因。

力大大增强,开始利用手中的机动财力大铺摊子,极大加剧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从而实际上成为政府推进“大跃进”的财税制度基础。

1956年的中共八大吹响了大干快上的号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基础上,大会通过“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导致《论十大关系》中关于产业结构调整总结成为泡影,在全国人民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中国经济增长率推高到了21.7%的历史高点。但是由于1957—1958年的体制下放过快过急,过于盲目,导致了全国基建规模膨胀,工业企业数、职工数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中央财力明显削弱,国家财政赤字累积和通货膨胀。^①本轮权力下放,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到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最高点(1960年甚至达到了39.3%),政府掌握的财力空前增强。但是积累过多导致经济发展持续性过差,“大跃进”失败后,宏观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出现了大幅负增长。从数据来看,1957—1958年的分权实验,同时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见图1-1)。

“大跃进”失败后,我国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经济建设新的指导方针。《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近两三年内将经济管理的大权收归到中央和中央局。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各级部门不得层层加码。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体制重新恢复到“总额分成,一年一定”。1962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中央回收下放给地方的诸多权限,再度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标志着第一次下放经济管理权的实验正式告终。中央重新掌握全部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审批和

^① 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投资,实行专项拨款制度,严格限制地方预算外资金,将一批下放的工业企业回收中央,^①加强财政、信贷、生产资料流通管理和劳动工资统一管理。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工农业总体水平超过了1957年,各结构指标开始恢复正常,财政收入比重稳定在27%—29%的水平(见图1-2),其代价是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明显的抑制。“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基本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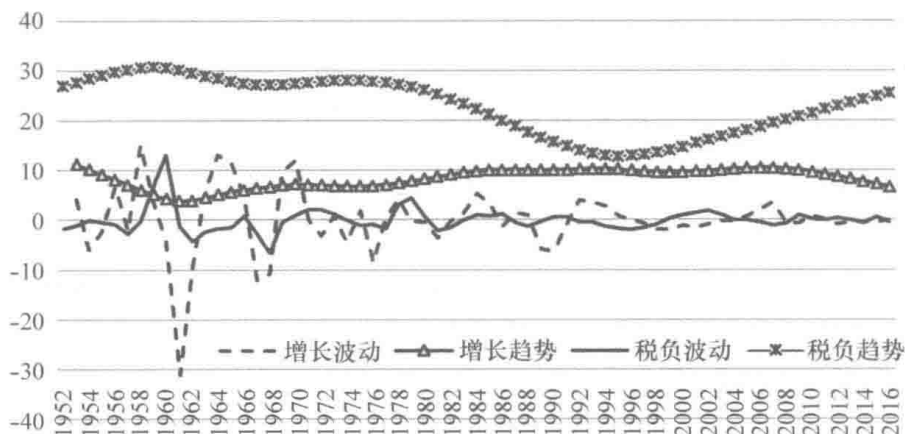


图1-2 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的演变趋势(1952—2016年)(%)

注:波动和趋势都是经HP滤波调整。

数据来源:Wind金融咨询终端。

1966—1976年,伴随着中国新一轮的“收放循环”^②,体制下放的主要措施是下放企业和管理权,精简国家机构,下放财政、物资、基建投资权,伴随着财政收入比重的大幅下滑。^③1969年5月1日,

① 1958年权力下放后,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只剩下1200个。1965年调整期结束后,中央企事业单位增加到10533个,各部直属企业单位的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42.2%,其中生产资料部分占55.1%(参见倪家铸、严英龙、陈升、章寿荣《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参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Chenggang 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 No. 4, 2011, pp. 1076–1151。

③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总结了中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缺点,认为是将注意力放在行政权力的分割和转移上,由此形成“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环”(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